

继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之后对唐代科举人物进一步考证，
为全面了解唐代科举盛况提供了一把钥匙。

登科记考再补正

王洪军 著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正補考紀科登

（清）王士禛撰



登科记考再补正

王洪军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登科记考再补正 / 王洪军著. —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1

ISBN 978-7-5633-9216-2

I. 登… II. 王… III. ①科举制度—研究—中国—唐代
②科举制度—研究—中国—五代 (907~960) IV. D691.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16521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山东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东段 邮政编码: 276017)

开本: 880 mm × 1 230 mm 1/32

印张: 13.75 字数: 350 千字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凡 例

一、《登科记考再补正》，意为在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之后所作的补正。主要依据新近出土的墓志、题记以及一些方志、宗谱等资料，并结合传世文献，对唐五代应举及第者进行了认真考订。凡吸收近年来其他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一并在文中注出。

二、凡徐松《登科记考》、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已经收录者，一般不再收录，而关涉订正、移正者除外。

三、应举登第有确切纪年者，以年代前后为序，不再单列进士、明经、诸科之科目，为便于读者检索，又将此类分为上（武德至长安）、中（神龙至大历）、下（建中至五代）三编。

四、应举登第无确切纪年者，以科目标类，如进士、明经、制科、秀才、诸科、武举、道举等；科目不详者列之于后。

五、在史籍、墓志文中自署为“乡贡进士”、“乡贡明经”者，如有其他相关资料确能证明其已参加礼部试且已及第者，录入相关科目中；如无其他资料能够证明其应举及第者，亦附于文后，以备研究者查考。

六、补录的科举及第者，一般标出其生卒年代、应举科目、具体郡望，而且注意收录了及第者的世系、仕宦、婚姻及子女的情况，以便于社会史研究者对所收资料加以利用。

序 言

所谓科举,就是“中国帝制时代设科考试,举士任官的制度”^①。科举取士肇端于隋,至唐而始盛,并且逐步制度化,成为我国古代社会统治者选拔人才的主要手段。

唐代的设科取士,科目繁多。《新唐书·选举志》载:“唐制,取士之科,多因隋旧,然其大要有三。由学馆者曰生徒,由州县者曰乡贡,皆升于有司而进退之。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经,有俊士,有进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开元礼,有道举,有童子。而明经之别,有五经,有三经,有二经,有学究一经,有三礼,有三传,有史科。此岁举之常选也。其天子自诏者曰制举,所以待非常之才焉。”可见,唐代的设科取士,有“岁举之常选”,即国家对考试的科目和要求有固定的规定,并按时举行的考试。岁举之外,另有“制举”,考试项目和考试时间都不固定,据宋朝人统计,有唐一代,制科的名目大约有 86 个^②。

记录各科登第者的姓名、郡望、年龄、行第等内容的书,称为《登科记》。据封演《封氏闻见记》卷三《贡举》条说,从中宗神龙(705—707)时起,就有人逐年记载登第进士的姓名,称作《进士登科记》。封演进士擢第后,“太学诸人共书余姓名于旧记末”,当时有个叫张綦的举子,初落第后,出于对进士及第的羡慕,就捧着那本《登科记》顶在头上,称“此‘千佛名经’也!”又据宋人《蔡宽夫诗话》

①刘海峰:《科举学导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8月第1版,第71页。

②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四《考史》,商务印书馆,1959年。

所记,“故事,放榜后,贡院小吏多录新及第人姓名,以献士大夫子弟之求者举者(疑当作求举者)。”^①这当是礼部贡院小吏因职务所近,将当年新及第进士的姓名记录下来,以献于士大夫子弟,备他们应酬交际及将来应试参考,有其实用目的。这样历年积累,也就自然成为登科记一类的材料。可见在唐代,登科记材料的纂集是相当普遍的。^②

唐人所编的《登科记》,在穆宗长庆(821—824)以前,就有十几种^③。《唐语林》卷四载,郑顥于大中十年(856)上登科记表中云:“自武德以后,便有进士诸科,所传前代姓名,皆是私家记录。”大抵在宣宗以前的登科记,都系私人所编。自宣宗时代起,由于皇帝的爱好和提倡,《登科记》出现了官书,即大中十年郑顥奉敕编进的《诸家科目记》十三卷(执笔者实为赵璘)。

然而,无论是私人所编还是官家所修,唐、五代的登科记在宋代即已残缺或失传,其后北宋人乐史补作《登科记》三十卷,南宋人洪适亦有《重编登科记》十五卷。但今天这些书都已亡佚。清人徐松以《文献通考》所载的唐登科记总目为科名,以人物为纲,从大量文献中选录科举资料,纂辑成一部三十卷的《登科记考》,于道光十八年(1838)成书。之后,当代学者孟二冬先生以中华书局1984年8月第一版赵守俨先生点校的《登科记考》为底本,广泛吸收近人、今人的研究成果,认真核查,详加甄辨,在占有大量新旧材料的基础上,对该书进一步考证补充,于2003年出版《登科记考补正》一书,为今人研究唐登科记集大成之作。

隋唐以后,在中国古代士人的仕学生涯中,应举登第入仕是士

①郭绍虞:《宋诗话辑佚》卷下,中华书局,1980年,第418页。

②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第4页。

③王应麟:《玉海》卷一一五《选举》引姚康《科第录叙》,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

人政治、社会生活中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可以说,科举考试不只是一种官吏选拔考试,它还带动了民间社会崇尚人文、教育,促进了传统儒学文化的传承与普及。科举成为一种包含着对知识阶层的作用、价值及地位积极认同的制度,一种在实践上保证知识阶层社会精英受到政府雇佣、受到社会普遍尊敬的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科举塑造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文化形态和知识分子的性格及形象。在唐人各种《登科记》等原始资料亡佚的情况下,徐松的《登科记考》对于唐代科举制度与人才、吏治、文学、史学等方面的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清代著名学者徐松(1781—1848)所撰的《登科记考》,是一部唐代科举编年史。它详细记载了自唐武德元年至周显德六年历届科第史料,素以搜采繁富、内容丰赡、材料翔备、考析精审而著称,是研究唐、五代人物、史事、科举和文学等方面的重要著作。它录存了有唐一代登科者,进士凡 2087 人,其中编年者 1404 人,入附考者 683 人;诸科凡 48 人,其中编年者 24 人,入附考者 24 人;明经凡 303 人,其中编年者 45 人,入附考者 258 人;制科、宏词、拔萃 562 人,其中编年者 486 人,入附考者 76 人。据孟二冬估计,唐、五代科举的基本阵容(包括秀才、进士、明经、制科、诸科、武举)约在三万人以上^①。而徐松撰写《登科记考》时,已距唐逾千年,众多史实已湮没无存,虽尽力搜求,仅得三千人,已实属不易。正如徐氏在《登科记考·凡例》中所言:“今所编辑,百不存一。”

该书自清道光十八年(1838)成书以来,一直受到学术界的重视。赵守俨先生在 1984 年《登科记考·点校说明》中,曾对该书的学术价值及其主要特点进行过归纳与点评,认为其著述取材宏富,而不伤于滥;注意反映有关科举取士各个方面的问题;考证和按语精

^①徐松撰、孟二冬补正:《登科记考补正》,燕山出版社,2003 年 7 月。

辟,可取的不在少数。同时也指出本书“疏漏错误亦复不少”。自20世纪40年代岑仲勉先生作《登科记考订补》之后^①,六十余年来,相继有罗继祖、卞孝萱、施子愉、傅璇琮、严耕望、陶敏、张忱石、胡可先、朱玉麒、陈尚君、杨希义、吴在庆、黄震云、陈冠明、薛亚军、王其祎、李志凡诸先生,皆对《登科记考》有所匡订纠补^②。此后,孟二冬先生从1994年至2001年积数年之功,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又从总集、选集、别集、正史、野史、笔记、墓志、方志、家乘、丛书、类书、姓氏书中,共辑出1471人(包括进士、明经、诸科、制科、宏词、拔萃、上书、上封、武举等,有编年者和附考者),徐、孟二人所辑相加,共有4471人,汇集成《登科记考补正》一书。这是继清人徐松之后,对唐、五代科举制度研究的重大收获。

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一书,所据资料仅限于2001年以前问世的资料,近年来陆续出版的《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

①岑仲勉先生《登科记考订补》一文,发表于《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1本,1941年9月。

②罗继祖:《登科记考补》,日本《东方学报》京都第13册第1分,昭和十七年(1943)六月;卞孝萱:《〈登科记考〉纠谬》,《学林漫录》第6集(1982年);施子愉:《〈登科记考〉补正》,《文献》第15辑;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中华书局1980年1月版;傅璇琮:《唐才子传校笺》(1~5册),中华书局1987年5月—1995年11月版;严耕望:《唐仆尚丞郎表》,中华书局1986年10月版;陶敏:《全唐诗人考》,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8月版;张忱石:《〈登科记考〉续补》上、下,《文献》1987年第1、2期;胡可先:《〈登科记考〉匡补》、《〈登科记考〉匡补续编》,《文献》1988年第1、2期;胡可先:《〈登科记考〉匡补三编》,《徐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朱玉麒:《〈登科记考〉补遗、订正》,《文献》1994年第3期;陈尚君:《〈登科记考〉正补》,《唐代文学研究》第4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杨希义:《〈千唐志斋藏志〉中隋唐科举制度史料辑释》,《中原文物》1992年第1期;吴在庆:《唐五代文史丛考·登科年考》,江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黄震云:《〈登科记考〉甄补》,《文教资料》1996年第4期;陈冠明:《〈登科记考〉补名遗》,《文献》1997年第4期;薛亚军:《〈登科记考〉正补》,《古籍研究》2001年第1期。王其祎、李志凡:《〈登科记考〉补》,台湾《台大历史学报》第19期,1996年6月出版;王其祎、周晓薇:《〈登科记考〉补续》,《碑林集刊》2000年8月。

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的《偃师杏园唐墓》，杨作龙、赵水森编著的《洛阳新出土墓志释录》，吴钢主编的《全唐文补遗》第八辑、《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全唐文补遗》第九辑，赵君平编的《邙洛碑志三百种》，赵君平、赵文成编的《河洛墓刻拾零》(上、下册)等书籍以及散见于报刊杂志的墓志碑刻资料，都是孟二冬当时所未见者。而且，即使是孟二冬已见资料中亦有遗漏。因此，笔者自 2004 年进行另一课题研究时，就已开始注意唐、五代科举人名录的问题，并开始从大量墓志资料中搜集辑录相关资料，制成表格，前后共辑录徐、孟二人所未载唐代科举及第者共 802 人，其中有确切纪年者共得 358 人，进士 136 人，明经 122 人，秀才 6 人，制科 52 人，诸科 15 人，科目不详者 26 人，知贡举 1 人。登第年份不详者共 444 人，进士 168 人，明经 134 人，制科 57 人，秀才 22 人，诸科 25 人，武举 8 人，道举 4 人，科目不详者 26 人。附考 336 人。并依墓志略详其生平。中华书局《文史》曾刊载胡可先先生《徐松〈登科记考〉补正》(《文史》2003 年第 2 辑，总第 63 辑，第 72~99 页，以下简称“胡补”)和张忱石先生《唐代登科人名录拾遗》(《文史》2008 年第 3 辑，总第 84 辑，第 101~158 页，以下简称“张补”)两文，对照胡、张二先生的文章，发现有部分登第人物相重复，为充分展现学界目前辑录的登科研究成果，重复部分一并录入，并对两文讹误之处加以订正，以资文史工作者参考。本补正漏误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目 录

序言	1
一 唐代登科记考研究综合述评	1
(一) 徐松《登科记考》述评	1
(二) 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述评	4
(三) 其他研究成果述评	8
二 有确切纪年者登科人名录订补(上)	12
三 有确切纪年者登科人名录订补(中)	74
四 有确切纪年者登科人名录订补(下)	114
五 无确切纪年者登科人名录订补	179
(一) 进士科	179
(二) 明经科	227
(三) 制科	282
(四) 秀才科	307
(五) 诸科	317
(六) 武举科	326
(七) 道举科	331
(八) 科目不详者	333
六 附录	344
参考文献	423
后记	427

一 唐代登科记考研究综合述评

(一)徐松《登科记考》述评

徐松(1781—1848),字星伯,直隶大兴(今属北京)人。嘉庆十年(1805)进士,是嘉庆、道光年间很有成就的学者。嘉庆十四年(1809)任《全唐文》馆提调兼总纂。授翰林院编修。后任湖南学政,因事获罪戍边。归授礼部主事。精于历史、地理之学,著有《西域水道记》、《新勘注地理志集释》、《汉书西域传补注》、《唐两京城坊考》、《登科记考》等书。

《登科记考》以马端临《文献通考》所载唐《登科记》总目为目,仿《资治通鉴》体例按年编次,从大量文献中选录唐、五代科举登第者及相关资料“编于各年之下”,于道光十八年(1838)成书。全书共分30卷,第1卷至第24卷所录为唐人,起唐高祖武德元年(618),终唐哀帝天祐四年(907)。第25卷至第26卷所录为五代时人,起梁太祖开平元年(907),终周世宗显德六年(959)。第27卷为附考。第28卷至第30卷为别录,其中绝大部分是唐代资料。经过徐松的考证,《登科记考》著录进士凡2087人,其中编年者1404人,入附考者683人;明经凡303人,其中编年者45人,入附考者258人;诸科凡48人,其中编年者24人,入附考者24人;制科、宏词、拔萃562人,其中编年者486人,入附考者76人。以上数字相加约3000人,大约是唐代科举人数的十分之一。^①

^①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上),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7月第1版,《自序》第12页。

唐代以科举取士,名目繁多,除进士科以外,其他各科的名称不下百数。很多著名的文学家、诗人、学者都是科举出身。所以登科记一类书是研究和考证他们生平的重要资料。傅璇琮先生在《关于唐代登科记的考索》一文中曾这样评价:“我们现在研究唐代的科举制度,不得不感谢一百多年前,也就是清朝道光年间的一位学者徐松。在有关唐代科举考试的重要史料登科记完全散失的情况下,徐松对大量的史料进行搜集、整理、排比和考证,著成《登科记考》。《登科记考》作为一部内容丰富的唐代科举编年史,向人们提供了唐、五代科举考试的发展衍变,以及有关人物的具体活动。徐松不以选拣几条干巴巴的正史有关条文为满足,而是注目于唐宋时期众多的杂史、笔记、诗文、小说,力图用对当时生活的具体记述,来重现唐三百年间对于文人生活和文学艺术有重大影响的科举考试几个重要方面的历史背景。这是一项开拓性的工作,应当看作是清代勃兴的考据学应用于学术史的一种积极尝试。”已故著名学者赵守俨先生,在《记考》(中华书局1984年8月出版)的《点校说明》中,对该书的学术价值和主要特点,更有具体而充分的评价,并指出:“本书的作用已远远超出登科记的范围,实际上是一部相当详备的、经过考订的唐五代科举史料编年,对于研究唐代的历史、文学都是很重要的参考书。”

作为一部内容丰富的“唐代科举资料史”,《登科记考》具有如下几个突出特点:

(1)取材宏富,认真而审慎

《登科记考》取材包括史籍、方志、类书、总集、别集、笔记小说、碑志石刻,范围甚广杂。如采《旧唐书》、《新唐书》、《唐会要》、《文苑英华》、《册府元龟》、《玉海》、《太平广记》、《永乐大典》及唐宋以来文集、笔记、诗话、方志,掇取有姓名可考者,将有关科名掌故的佚事用小字注于其下。又因《玉海》载乐史有《唐登科文选》五十卷,

《文苑英华》载唐人赋策每引登科记注其异同,证明历来登科记每载试文,所以也据《文苑英华》及各家文集将试文依年载入。资料的搜集虽不能说已做到纤细不遗,但确已将唐代科举的重要资料条分缕析,粹为一编。另外,徐松对待资料的态度并非以多为胜,而是作了较为认真的选择。如他在凡例中谈到:“图经,家乘,例载科目,而近世府厅州县志袭谬承讹,动遭指摘。……颜师古《汉书注》云:‘私谱之文,出于闾巷,家自为说,事非经典,苟引先贤,妄相假托’,今同斯例,概就刊落。惟见于《永乐大典》所引者,皆宋元旧笈,事有可征,尽行采录。”^①

(2) 内容丰富,史识可嘉

《登科记考》不拘泥于对登科者姓名年代的辑录和考证,而是注意反映有关科举取士各个方面的问题。例如,本书附载了大量的策赋诗文,对于探索唐代取士的标准和倾向,以及不同时期的文风都大有作用。再如科举取士在有唐一代虽然在不断发展和制度化,却始终遭到一些人的反对。在考试内容方面,重文艺还是重经术,录取对象,以“子弟”为主,还是以寒门为先,都存在着不同意见。凡能够反映上述问题的材料,编者都没有忽略,这也说明了徐松的史识。

(3) 考证和按语精辟

孟二冬先生在他的《〈登科记考〉补正赘语》一文中说:“例如《永乐大典》那样一部大书,凡载有唐人登科者,徐松皆一一详加征引,所获甚多。今经重新仔细阅读核对,其所征引皆为确切,而其所遗漏者,亦不过十四人而已。确实令人叹服。”作者在书中对一项科目设置的原始,多附加按语,以引起读者的注意,“如卷五开元五年(717)博学宏词科下按语说‘按博学宏词置于开元十九年,则此犹

^①[清]徐松:《登科记考》(上),中华书局,1984年8月第1版,《登科记考·凡例》第2页。

制科也。’同上卷开元二年(714)进士科下引《永乐大典》‘赋’字韵注称:‘开元二年,王邱员外知贡举,始有八字韵脚。’又指出:‘按杂文之用赋,初无定韵,用八韵自此年始。’卷九天宝十三载(754)词藻宏丽科,引《册府元龟》之文,以说明此年为制举试诗赋之始。”^①

总之,《登科记考》取材宏富、考订精审、论证缜密,但是以一人之力网罗唐、五代三百余年的科举之事,不免有所遗漏及失误,岑仲勉先生于1941年曾写过《登科记考订补》一文(《历史语言所集刊》第11本),指出徐书重复、错误、缺漏多条。再如孟二冬先生所考证的《记考》“卷二七《附考·制科》据颜真卿《颜惟贞碑》著录有‘颜说顺’。今考《全唐文》卷三四〇颜真卿撰,《唐故通议大夫行薛王友柱国赠秘书少监国子祭酒太子少保颜君(惟贞)碑铭》:‘康成、强学、希庄、日损、隐朝、邻几、知微、舒、说、顺、胜、式宣、韶,并进士、制举。’此为徐松所本。然原文当作‘说顺’还是‘说、顺’?此处似难遽定。再考同上书卷三三九颜真卿撰《晋侍中右光禄大夫本州大中正西平靖侯颜公(含)大宗碑》:‘舒,俊才,制举,长安尉。说,明经,有才器,渭南丞。顺,孝悌,进士,评事。胜,进士,左补阙。’是知徐松将颜说、颜顺二人误合为一人。”^②

(二)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述评

孟二冬(1957—2006),安徽宿县人,中共党员,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学科专长为中国文学史及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孟二冬先生淡泊名利,甘于寂寞,潜心治学,撰写了《中国诗学通论》(合著)、《中唐诗

^①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上),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7月第1版《自序》第2页。

^②孟二冬:《孟二冬文存》(上卷),《〈登科记考〉补正赘语》,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4月第1版,第363~364页。

歌之开拓与新变》、《韩孟派诗传》、《千古传世美文》、《陶渊明集译注》、《中国文学史》(参编)等 400 多万字的专著。他历时七年,经过大量艰苦的研究,完成了 100 多万字的《〈登科记考〉补正》,荣获北京市第八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以及北京大学第九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得到了我国文学界和史学界的高度评价。

孟二冬先生的《登科记考补正》(以下简称为“《补正》”)是今人研究唐人登科记的集大成之作。作者在《〈登科记考补正〉赘语》一文中谈道:“为唐代文史研究提供一个更加丰富而且可靠的文本,这是我补正《登科记考》的初衷。”“我所做的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凡徐松所缺考失收者,皆予以新的考证和补充;第二,凡徐松所考有误而需要重新调整或删并者,皆予以辨证而加以移正或删并;第三,凡徐松所考有误而需要删除者,则予以删除,同时论证删除的原因;第四,凡有比徐松所引更早或更确切可靠的材料,皆予以补充,以丰富和加强该书的史料价值;第五,对于《登科记考》第 28 至 30 卷的《别录》部分,除补充个别重要篇章外,主要是对原文做些校正或辨误的工作。”他以中华书局 1984 年 8 月第 1 版赵守俨先生点校的《登科记考》为底本,广泛吸收近人、今人的研究成果,认真核查,详加甄辨,并在占有大量新旧材料的基础上,对徐松所缺考失收者,予以新的考证和补充,对徐松所考有误者,予以辨证,为唐、五代文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更加丰富、可靠的文本,为海内外学者提供了一套更加有用的重要参考资料。该书之长,可归结为以下几点:

(1)增补内容丰富

《补正》一书的作者在广泛查阅各类资料并经仔细考订研究之后,新增补进士凡 648 人,其中编年者 214 人,入附考者 434 人;明经凡 367 人,其中编年者 106 人,入附考者 261 人;诸科 128 人,其

中编年者 36 人,入附考者 92 人,制科和宏词(仅录编年者)、拔萃(仅录编年者)凡 296 人,其中编年者 95 人,入附考者 201 人;此外,还新增补上书拜官 8 人(仅录编年者)、上封拜官 2 人(仅录编年者)、武举 22 人,其中编年者 3 人,入附考者 19 人。以上数字相加共 1471 人,已经接近徐松《记考》登科人数的一半。另外,还新增补和移正知贡举者凡 33 人;补徐考缺名和改正姓名者凡 60 余人;改正科目和移正科目年代者凡 200 余处;新增补年代可考的应试诗赋策文等 90 余篇。

(2) 考证资料翔实

作者广泛征引在徐松之后新发现的唐代金石资料,如《千唐志斋藏志》、《北京图书馆藏中国石刻拓本汇编》、《隋唐五代墓志汇编》以及周绍良主编的《唐代墓志汇编》(以下简称为“《汇编》”)、吴钢主编的《全唐文补遗》(以下简称为“《补遗》”)等等,都是《补正》取材的渊藪。这些石刻文献保存了许多与唐、五代科举有关的珍贵史料,具有很高的真实性。如:《补正》卷二显庆六年辛酉(661)下“高像护”。原作“高□”,徐氏考云:“陈子昂《离狐县丞高府君墓志铭》:‘君讳某。龙朔元年有制举忠夔,君对策及第。试永州湘源县尉。’按显庆四年有志标忠夔制科,制举忠夔殆亦此类。”孟按:陈子昂所撰墓志见《汇编》(天授 032)天授二年(691)十月二十三日《大周故宣议郎骑都尉行曹州离狐县丞高府□(君)(像护)□□□(墓志铭)》(北京图书馆藏拓本)云:“君讳像护,字景卫,其先渤海蓍人也,因仕居洛,今为阳翟人。……唐龙朔元年,有制举忠夔,君对策及第,试永州湘源县尉。”(注:方框阙字据《全唐文》卷二十一补。)今补其名。亦见王补。^①此外,徐松《记考》无一兵部武举常科之例,而孟二冬《补正》则从唐代碑刻、墓志中检出兵部武举常例之登科者,予以增补,这也是一个重要的突破。

^①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上),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 年 7 月第 1 版第 58 页。